

论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

许原泰

提要: 新加坡开埠于 1819 年, 但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 很可能更早于开埠前的马来酋长管辖阶段, 而且是肇始于安葬移民海上浮尸和树下死尸的“移鬼”形式, 属于从坟地庙宇拓展出来的大伯公信仰。这项研究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属于移民迁徙半途不幸死亡而成的“移鬼”形式, 比一般学者认为的移民携带香火或神像分身渡海南下的“移神”形式更早, 其祭祀初衷也更自然和纯朴。

许原泰, 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候选人。

关键词: 道教 大伯公信仰 坟地庙宇 移民 移神 移鬼

一、前言

1991 年, 时任香港东南亚研究所教授的邱新民先生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邀请, 在“海上丝绸之路综合性考察”(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Marine Silk Route) 的研究报告中, 提起可以证明早在 1819 年以前, 已有华族移民居住在新加坡的主要证据, 除了“海峡殖民地政府档案”和“三州府土地局买卖簿册”的官方档案记录以外, 就是华族移民建立的华人庙宇, 分别是在 1819 年之前便已存在的“福德祠”和“顺天官”^①。

然而, 将新加坡最早期的道教庙宇, 追溯到莱佛士爵士登陆新加坡之前, 可靠吗? 早在 1819 年之前, 就已有两座道教庙宇建立于新加坡海岸或河口之说法, 有足够翔实的史料论证否? 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些疑问的可能性。

二、新加坡最早期的两座华族庙宇

1. 海唇福德祠 (又称“直落亚逸街海唇福德祠”, 或“源顺街海唇福德祠”)

海唇福德祠, 至少在 1824 年 (清朝道光甲申年) 已经存在于新加坡。该庙内悬挂着一幅匾额, 便是一个证据。饶宗颐教授记载“此为星洲最古之文物”^②, 该匾额是由广惠肇三属移民所赠送, 如下:

广惠肇三府众信士敬送

赖及遐邇

咸丰四年重修

道光岁次甲申年春吉立^③

然而, 若根据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的记载, 这座以大伯公为主祀神的海唇福德祠的建立, 可以追溯到新加坡正式开埠之前:

在创设青山亭之前, 于清仁宗嘉庆年间, 属人同祀有大伯公神座于海唇, 即今源顺街海唇福德祠神庙也。据前人所述, 当日神座为一长者之坟地, 初不过陋小而仅具规模, 后以声灵赫濯, 远近蒙麻, 遂至祈祝者日众, 及道光甲申, 乃集众而扩建之, 并为属人多谋福利之事, 由是香火日盛^④。

李奕志在 20 世纪 70 年代做田野调查时, 进一步追溯了这位长者坟地的一些细节。这位长者姓陈, 当时的直落亚逸街还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堤, 于清仁宗嘉庆年间, 陈姓长者浮尸漂至该海岸, 居民捞而葬于岸边^⑤。

清仁宗嘉庆年间, 即公元 1796 年至 1820 年。虽然陶公铸和李奕志都没有明确指出, 该庙神座是建于清仁宗嘉庆年间的第几年, 但根据福德祠绿野亭信托人古天任的撰文记载, 当时莱佛士还没有开辟新加坡。当长者浮尸停留在海边时, 是广客二属人士筹资收敛尸体在原地埋葬。后来因为神灵显赫, 前来膜拜者皆认为灵验非

常，便筹资在 1824 年于该神座建筑一座庙宇，命名为“福德祠”^⑥。在这些华族移民的心目中，这位长者就是庇佑他们的大伯公，该公会的董事蓝禹甸便在该公会的《章程缘起》中直接指出：“再考福德祠地址，乃大伯公肉体埋葬之坟墓。”^⑦

陶公铸和古天任，都是福德祠绿野亭公会的元老，李奕志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亲自到海唇福德祠做田野调查的社会工作者。他们都一致考证确定，海唇福德祠原本是一座坟地，建立于清仁宗嘉庆年间（1796—1820），应是不容置疑的。马来西亚刑事侦察局局长兼星马私会党问题专家英国人 Dr. Leon Comber（梁康伯博士），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亲自到新加坡多间华族庙宇做实地的田野调查后，记载该福德祠看起来是初建于 1820 年，比较明确地划定了该庙的兴建年代^⑧。

至于古天任进一步指出的，长者浮尸漂流至该海岸之日，是莱佛士还没有开辟新加坡之时，由于这是孤文单证，还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故本文暂且存疑。然而，若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一个移民社群有能力在 1819 年之后的第五年，将一座简陋的坟地神祠扩建成一座香火日盛的庙宇，意味着该地确实已经集聚了相当数量的华人移民，形成了一个规模不会太小的移民聚落。若说这个移民聚落的雏形可以追溯到马来酋长天猛公驻守新加坡时期，坟地小庙的建立是在莱佛士爵士登陆之前便已存在，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观点。

与这座大伯公庙有类似建庙因缘者，是另一座新加坡百年大伯公庙丹戎巴葛福德祠。该庙坐落于珊顿道珀玛律（Palmar Road, off Shenton Way），故又称珀玛律福德祠；因其庙面向大海，亦称望海大伯公庙。该祠庙宇虽然是建于 1844 年，但庙宇雏形是奠定于 1819 年^⑨。据考查，这间福德祠在未创建之前，有棵大树，一位客籍老乞丐在树下归化，后来客籍移民就在树下建起一座小庙，供奉大伯公^⑩。

海唇福德祠，是将一个埋葬华族移民海上浮尸的坟地，扩建成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大伯公庙宇；丹戎巴葛福德祠，则是将老乞丐在树下去世的地点，改建成一座具有将近两百年历史的大伯公庙。这两所福德祠，都是本文所谓的“移鬼”之类的华族庙宇。然而，若从道教的角度来看，“人鬼”与“地祇”其实是属于两种不同层次的概念，

但在新加坡华族移民的大伯公信仰中，这两者的界限是模糊的。

2. 顺天宫

顺天宫，也是一座大伯公庙，坐落于马拉巴街（Malabar Street，俗称“白沙浮”）。这座小庙宇已在 20 世纪末拆除，但根据 Dr. Leon Comber 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田野调查，该神庙以亚答屋的简陋形式建立于 1821 年，后来在 1840 年代重建和扩充，并于 1903 年大规模装修。该庙宇的香客，以福建籍妇女居多^⑪。

根据陈荆和与陈育崧编著的《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内《重建顺天宫碑记》的记载，该庙则是“建自嘉道之际”^⑫。《南洋商报》记者黄义秋在 1981 年报道顺天宫信徒在庙后墙壁重新发现这两块尘封已久的石碑时，推算所谓的“建自嘉道之际”，即表示该庙是建于 1808 年。黄义秋的推算如下：

根据“重建顺天宫碑记”记载：顺天宫建于嘉庆与道光之际。嘉庆与道光都是大清皇朝年号，嘉庆元年是公元 1796 年；道光元年是 1821 年，嘉、道之间，应该是在 1808 年上下，距今已有 170 多年之久^⑬。

邱新民教授认同黄义秋的推算，并在《南洋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顺天宫碑石的发现小语》，以此历史文物论证他的一贯主张，莱佛士登陆前，新加坡绝不是一个荒凉小岛：

在 1819 年之前已有华人建筑的庙宇，表明这庙宇是许多人共同祀奉的地方，聚族聚群而居，崇拜大伯公。大伯公是新马华人自己“封”的神明，是土地神也是海神，与华南人士有直接关系。莱佛士计划市区，划为西方人士及阿拉伯人居住地之前，这里已有大量来自华南的华人了……这碑石的发现，说明了一重要事实……莱佛士并不是新加坡的开埠人，新加坡早就是一商埠了，莱佛士只是占领新加坡后计划加以扩展，西方化的殖民主义的代理人，英人的新加坡英雄……于是一般所谓新加坡为一小渔村及 150 人的历史，是伪造的历史^⑭。

黄义秋的报道，以及邱新民的支持与大胆分析，在新加坡学术界激起了一番讨论热潮。《海峡时报》编辑蔡良乾刊登采访邱新民的英文报道“The find that may restart the controversy: Long lost tablet to throw light on history”，向

英文读者群介绍了邱氏的观点，并提出新加坡历史或须重写的可能性^①。《南洋商报》另一名记者向民在分析这宗新闻时，也认同邱新民的观点，并呼吁有关当局保留该碑石和顺天宫，使这两者既可以丰富新加坡的历史，也成为吸引旅客的文物^②。然而，国立大学历史系的两位讲师萧启庆博士和周恩勤博士，则对顺天宫的建造年代提出质疑，表示不认同邱新民的看法。萧启庆亲自前往该庙翻译该碑文，提出了另一种分析：

碑文说庙宇是建于嘉庆（1796—1820）与道光（1821—1850）这两个年号之际。这表明了建筑日期应介于 1820 年和 1821 年之间……关键词是在于“之际”，它指出 1820 年和 1821 年之间的分线。如果它是说着两个统治年号“之中”，那么邱氏所说的 1808 年将可能是正确的^③。

顺天宫，很可能是在莱佛士登陆以前便已存在的华人古庙，引发了新加坡是否确实是由莱佛士在 1819 年开埠的历史真伪大辩论。从顺天宫石碑的“重新发现”开始^④，这个课题继续在各大中英文报章上掀起一阵骚动。陈永堃在《海峡时报》刊载了“Only 150 people? – Scholar Disagrees”，继续探讨莱佛士登陆之前，新加坡已是一个商埠海港的可能性^⑤。吴垂勋在《星洲日报》刊载了《新加坡必须以独立的姿态重新编写自己的历史》，强烈呼吁新加坡人必须重写历史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吴氏认为，因为莱佛士的英人身份和背景，若把华人比他先来新加坡的史实记录在案，会引起人们觉得华人应享有“先入为主的权利”；若把华人写成是匿藏在岛上的“海盗”，则有欠公允之嫌。故莱佛士采取迂回写法，“新加坡岛上有 150 个马来渔民”，堪称是最聪明与最妥善不过的方法^⑥。

远在美国的洪镰德博士也投稿到美国旧金山发行的《远东时报》，发表《新加坡寻根之辩》，详细追踪这项由顺天宫碑石所引发的一系列热烈讨论。在提到国大讲师周振中博士反驳邱新民的推断缺乏充足证据的支持，认为“有关新加坡人口早期的记录，可从莱佛士的信件中看出一斑”时，提出了与周氏完全相反的结论：

莱氏在 1819 年 6 月 11 日致索末塞（Somerset）公爵夫人信上指出，他登陆新加坡不过 4 个月，该地人口激增，已不下 5

千人，多数为华人。不过，我们也可以藉此信做出与周氏相反的结论，那就是说何以在短短 4 个月之间，新加坡人口由 150 人激增至 5 千人？这岂不是意味莱佛士初发现渔村为 150 人的聚落，另外尚有岛上未被发现而后来涌入的华人及其居住的村落^⑦？

向民和邱新民先后撰文支持洪镰德博士的推论^⑧。邱新民除了继续在报章发表两篇文章，以顺天宫石碑的重新发现为基调，结合其它文献资料论证其观点外^⑨，还对于“建自嘉道之际”的关键词“之际”，根据《辞海》、《辞源》、《最新汉语大词典》、《新词典》、《汉语词典》等词典的几个解释，如“介于其间”、“适当其时”等，归纳了该词关于时间性的意义：“会合”、“中间”和“交接”，再次推论“嘉道之际”当为 1808 年，尽管这仅是一种估计罢了^⑩。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石碑内容关于建庙的年代，仅镌刻相当含糊的“建自嘉道之际”，没能给后人一个明确的年代指示，故顺天宫究竟是不是建于 1808 年，在还没有发掘到其他的相关佐证之前，本文不予肯定。然而，从上述诸位专家学者的热烈辩论中，顺天宫是建立于莱佛士登陆之前，确实有其不能回避的可能性。

顺天宫在被拆除之前，宫内分成左右两殿。右殿主神龛是供奉大伯公，是该神宫的主祀神，小神龛则是供奉注生娘娘；左殿两个神龛分别供奉观世音菩萨和孙大圣。宫内另有一个小柜台售卖祭祀用品，如红烛、金银纸和护身符等。同时有几个道士在庙内为善男信女算命^⑪。顺天宫是属于新加坡道教性质的神庙，毋庸置疑。

三、结 论

综合上述，我谨对新加坡的道教起源，作出以下的四点小结：

第一，海唇福德祠和顺天宫，建立于 1819 年之前的证据虽然还不充足，但其可能性是存在的。若包括创建于 1819 年的丹戎巴葛福德祠在内，这三座最古老的华族道教庙宇，都不约而同地以星马本土化的大伯公为主祀神，是非常典型的民间信仰形式，亦为新加坡道教起源的特点。

第二，海唇福德祠和丹戎巴葛福德祠的建立，都与客死异乡的华族移民有关。前者的尸体是从海上漂浮而来，后者则死于一棵树下。当时的客家移民直接在尸体出现处埋葬死者，并在坟

地上盖起了小庙，也都供奉大伯公神像，属于“移鬼”形式的民间道教信仰。关于本文所归纳的第一点与第二点结论，与一般学者认为新加坡的道教信仰，最早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乘船渡海时，同时携带家乡守护神或香火才传入的论点，有显著的不同。若论先后次序，应该是先有大伯公信仰的“移鬼”形式，而后才有闽粤移民的家乡守护神或香火正式登陆星州的“移神”形式。

第三，以安葬客死异乡的移民为前提，坟地上的大伯公庙宇与大伯公神像，都转化成了华族移民在茫茫异乡延续慎终追远的凝结式文化符号。至于这种以大伯公为缅怀亡灵、安抚生者的文化符号之传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闽粤省份，而是直接来自更早期从闽粤省份移民到马六甲的华族后裔。换言之，新加坡道教信仰的创始，是结合了中、马、新两岸三地的民间道教风格。

第四，在这半拓荒式的移民时代，坟地庙宇的性质是最淳朴的：单纯地安葬亡魂，单纯地焚香祭祀，纯粹是自动自发的民间宗教情怀，完全没有掺杂复杂的社会功能，与后来的新加坡道教庙宇之性质截然不同。

(责任编辑：首之)

- ① 邱新民：《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页168-180。
- ② 饶宗颐：《新加坡名称华文异译表》，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新加坡古事记》（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页382-383。
- ③ 李奕志：《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以下简称《海唇》），见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页199。
- ④ 陶公铸：《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见《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一百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一八二四年至一九九九年》（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1999），页36。
- ⑤ 李奕志：《海唇》，页200。
- ⑥ 古天任：《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之演化历程》，见《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一百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一八二四年至一九九九年》（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1999），页99。
- ⑦ 蓝禹向：《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章程缘起》，见《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一百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一八二四年至一九九九年》（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1999），页90。
- ⑧ Comber, Leon, *Chinese templ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58, p.

60.

- ⑨ 陈波生：《申请保留古庙为国家古迹》（以下简称《古迹》），见陈波生：《百年公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纪事》（新加坡：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和客属八邑福德祠，2006），页5；Lip, Evelyn, *Chinese temple Architectur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1-62; Comber, Leon, *Chinese temple in Singapore*, pp. 61-62.
- ⑩ 吴华：《丹戎巴葛福德祠》，见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页189；Lip, Evelyn, *Chinese temple Architecture in Singapore*, pp. 61-62.
- ⑪ Comber, Leon, *Chinese temple in Singapore*, p. 54.
- ⑫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以下简称《碑铭》）（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2），页152。
- ⑬ 黄义秋：《两块尘封石碑重见天日后发现白沙浮一大伯公庙历史竟有一百七十年建于嘉庆道光年间曾重建两次》，见《南洋商报》（新加坡），1981年9月11日。
- ⑭ 邱新民：《顺天宫碑石的发现小语》，见《南洋商报》（新加坡），1981年9月17日。
- ⑮ Leong Kian, Chua, “The find that may restart controversy: Long lost tablet to throw light on history?” *The Straits Time*, Singapore. 20th September 1981.
- ⑯ 向民：《由顺天宫想起的》，见《南洋商报》（新加坡），1981年9月25日。
- ⑰ 《针对邱新民的看法 国大两讲师提出质疑》，见《南洋商报》（新加坡），1981年10月1日。
- ⑱ 顺天宫的石碑，其实早已被陈荆和与陈育崧记载于1970年代编撰的《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里，但记者黄义秋于1980年代初的“重新发现”之报道，才真正引发了这场大辩论，使这两块石碑的记载被赋予了更重大的历史意义。
- ⑲ TJS, “Only 150 people? - Scholar Disagrees,” *The Straits Time*, Singapore. October 1981.
- ⑳ 吴垂勋：《新加坡必须以独立的姿态重新编写自己的历史》，见《星洲日报》（新加坡），1981年11月2日。
- ㉑ 洪镰德：《新加坡寻根之辩》，见邱新民：《新加坡寻根》（新加坡：胜友书局，1990），页146-148。
- ㉒ 邱新民：《新加坡寻根之辩我不敢掠美》，见《南洋商报》（新加坡），1981年11月11日；向民：《顺天宫与新加坡历史》，见《南洋商报》（新加坡），1981年11月5日。
- ㉓ 邱新民：《1819年莱佛士登陆前新加坡已是一商港》，见《星洲日报》（新加坡），1981年10月5日；邱新民：《莱佛士登陆前已知有新加坡》（以下简称《登陆》），见《星洲日报》（新加坡），1981年11月19日。
- ㉔ 邱新民：《登陆》，1981年11月19日。
- ㉕ Comber, Leon, *Chinese temple in Singapore*, p. 54.